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

——基础、挑战与环境塑造

柴 瑜 王效云

【内容提要】 2015年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元首开启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进程，“一带一盟”对接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对于对接基础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范式，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核心基础，即各国均面临提高经济复杂度的要求，而产能合作则是提高经济复杂度的关键举措；同时指出对接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期待错配、领域错配、主体错配和环境错配等四个方面。本文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双方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产能合作相关制度的保障。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亚经济联盟 “一带一盟”
经济复杂度 产能合作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白关系史研究（1992~2020）》。

【作者简介】 柴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王效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丁美洲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是新时期由中国和俄罗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发展战略，分别提出和主导的欧亚大陆空间上的经济合作倡议和一体化安排。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上的核心国家，与其达成共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识，将双方的发展战略、规划、制度和项目等进行对接，对于顺利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自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以来,“一带一盟”对接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的:

第一,探讨“一带一盟”对接的可能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俄罗斯的态度、联盟成员国的战略考量和利益诉求(谢晓光、生官声,2016^①;王宪举,2016^②;孙力^③,2016;向洁等,2017^④);“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共性与差异(李兴,2015^⑤;陆兵,2016^⑥;展妍男,2017^⑦;宫艳华,2017^⑧);“一带一盟”现有的政治和经贸合作基础(王海燕,2016^⑨;向洁等,2017^⑩)。

第二,分析对接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现有研究认为,“一带一盟”对接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包括:“三股势力”和“颜色革命”等安全威胁(王海滨,2017^⑪;王海燕,2016^⑫;张艳璐,2016^⑬;谢晓光、生官声,2016^⑭)、对“一带一盟”的认知和定位差异(万青松,2016^⑮;谢晓光、

① 谢晓光、生官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面临的挑战及应对》,《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② 王宪举:《俄对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的态度及中国应采取的策略》,《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第4期。

③ 孙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亚国家视角的分析》,《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④ 向洁、何伦志、闫海龙:《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带一盟”对接之基础、困境、模式与路径探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2期。

⑤ 李兴:《“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比较分析与关系前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⑥ 陆兵:《“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聚同化异规避风险》,《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⑦ 展妍男:《“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差异与对接》,《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

⑧ 宫艳华:《欧亚经济联盟的规则、成效与前景》,《西伯利亚研究》2017年第3期。

⑨ 王海燕:《“一带一盟”对接的基础、领域与挑战》,《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⑩ 同④。

⑪ 王海滨:《论“一带一盟”对接的现实与未来》,《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

⑫ 同⑨。

⑬ 张艳璐:《试析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障碍》,《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⑭ 同①。

⑮ 万青松:《试析当前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难题——兼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生官声, 2016^①)、“一带一盟”的机制差异(张艳璐, 2016^②; 向洁、何伦志、闫海龙, 2017^③)、西方国家干扰、地区国家的矛盾与利益分歧(王海滨, 2017^④)、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存在诸多问题(谢晓光、生官声, 2016^⑤)、双方交通等技术标准不一(王海燕, 2016^⑥; 王海滨, 2017^⑦)等。

第三, 探讨对接的模式和路径。向洁、何伦志、闫海龙(2017^⑧)在现有研究“一带一盟”对接的三种模式基础上, 即与欧亚经济联盟直接对接(多边)、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择优对接(双边)、借力上合组织平台合力对接(跳板), 提出了第四种综合对接模式, 以上合组织为平台, 内外齐联, 双多并进。张宁(2016^⑨)、张恒龙(2016^⑩)等对上合组织平台下实现“一带一盟”对接进行了详细探讨。此外, 刘清才、支继超(2016^⑪)、冯玉军(2016^⑫)、万青松(2016^⑬)、王彦芳、陈淑梅(2017^⑭)等都从不同视角探究了“一带一盟”对接的可行路径。

现有关于“一带一盟”对接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 但从理论视角深入

① 谢晓光、生官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面临的挑战及应对》,《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② 张艳璐:《试析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障碍》,《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③ 向洁、何伦志、闫海龙:《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带一盟”对接之基础、困境、模式与路径探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2期。

④ 王海滨:《论“一带一盟”对接的现实与未来》,《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

⑤ 同①。

⑥ 王海燕:《“一带一盟”对接的基础、领域与挑战》,《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⑦ 同④。

⑧ 同③。

⑨ 张宁:《“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在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贸易制裁问题》,《欧亚经济》2017年第4期。

⑩ 张恒龙:《组建上合组织自贸区,推进“一带一盟”对接》,《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⑪ 刘清才、支继超:《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基本架构和实施路径》,《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4期。

⑫ 冯玉军:《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路径》,《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⑬ 万青松:《试析当前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难题——兼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⑭ 王彦芳、陈淑梅:《“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模式研究》,《亚太经济》2017年第2期。

分析两者对接基础的文章则比较少。如果对接基础的探讨不够充分,就无法有针对性和有说服力地把握问题和推演政策。本文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范式,从经济复杂度的概念入手,考察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核心基础,试图发现产能合作诉求背后、超越互补性的经济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找到对接挑战的四个根源,从而为对接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思路。

一 对接的理论基础

“一带一盟”的对接应从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出发,而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对接能为双方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增长理论不断深化发展,有学者将研究聚焦在了产品空间和比较优势演化的理论上,提出了经济复杂性的概念,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工具,有助于我们将对接需求的认识建立在把握经济结构核心特征的基础之上。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增进国民财富。而分工与专业化的出现,取决于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20世纪50~60年代,拉美结构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限制了其产出和收入分配的能力(罗森斯坦·罗丹,1943^①;劳尔·普雷维什,1949^②;汉斯·辛格,1950^③;阿尔伯特·赫希曼,1958^④;塞尔索·弗塔多,1959^⑤)。该理论曾获得广泛关注,并指导了当时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但由于缺乏有说服力的模型以及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经济学家对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

① P. N. Rosenstein - Rodan, Problems of Industrialis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 - Eastern Europ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53, No. 210/211 (Jun. - Sep. , 1943), pp. 202 - 211.

② Rau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United Nations, 1949.

③ Hans W. Singer,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0, pp. 473 - 485.

④ Celso Furtado Albert O. Hirschma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⑤ Furtado, Celso, Formação Econômica Do Brasil, RJ: Fundo de Cultura, 1959.

长关系的关注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是一系列建立在 Dixit – Stiglitz 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内生增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技术差距是各国发展水平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系列理论模型探讨各国之间技术差异的背后因素以及技术进步的演化路径。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模型分别是产品种类模型（保罗·罗默，1988）和产品质量阶梯模型（Aghion – Howitt, 1992^①, Grossman – Helpman, 1991^②）。这类模型暗含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产品空间是连续且同质的。由此，在考虑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时，具象的产品被抽象化进而忽略掉了。R. 豪斯曼和 B. 克林格（2007）^③ 提出了产品空间和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认为产品空间是离散且异质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即产品的空间结构决定了一国比较优势的演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一国当前所处的产品空间的位置极大地影响其今后生产转型的机会和经济增长的速度。R. 豪斯曼、杰森·黄和 D. 罗德里克（2007）^④ 在产品空间中引入一个一维变量——产品复杂度，来刻画产品的特征。研究指出，在控制了一国初始发展水平之后，一国出口产品的初始复杂度越高，其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然而这一对产品空间的一维特征描述不足以体现产品关系和产品空间结构的丰富性。C. A. 伊达尔戈和 R. 豪斯曼（2008）^⑤ 进而提出利用网络来描述产品之间的关系和经济发展。他们认为，有关经济发展的更加细致的思路应该聚焦于一国如何开发更多的产业和产品，而不只是描绘如何积累资本，并指出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复杂度不同，即国家所拥有的生产技术和能力的多样性不同^⑥。这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作者指出以往实证研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

① P. Aghion, P. Howitt,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2), 1992, pp. 323 – 351.

② G. Grossman, E. Helpman,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pp. 43 – 61.

③ R. Hausmann, B. Klinger,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duct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Cid Working Papers*, 2007.

④ R. Hausmann, J. Hwang, Dani Rodrik,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pp. 1 – 25.

⑤ C. A. Hidalgo, R. Hausmann, A Network Vie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eveloping Alternatives*, 2008, pp. 5 – 10.

⑥ C. A. Hidalgo, R. Hausmann, The building block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U. S. A.*, 2009, Vol. 106, No. 26.

展是因为没有度量经济复杂度的科学方法，相反都强调积累一些高度综合的生产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或一般制度措施，忽视了生产所需要素的特殊性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匹配性和互补性。在网络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构建了衡量一国经济复杂度和产品复杂度的指标，并指出经济复杂度可以很好地反映一国可用的生产能力集合，与一国人均收入水平高度相关，并预示着后续的经济增长潜力。作者指出，一国生产结构转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开发出运用已有能力生产的新产品以及积累新能力并将其与已有能力结合从而开发出更多更复杂的新产品。

C. A. 伊达尔戈和 R. 豪斯曼的经济复杂度理论使得人们重新开始关注发展经济学和拉美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生产结构，并丰富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单纯地注重积累资本或人力资本要素，而忽视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不足以带动一国的经济发展（D. 哈特曼等，2016）^①。产品是生产技术和能力的载体及外在体现，如果生产一种产品需要一种特殊的知识或知识的集合，那么一国能够生产这种产品则意味着该国已经获得了这样的知识。经济复杂度通过对产品特征的刻画，映射出其背后的综合生产能力信息，丰富了单纯用资本、人力资本或制度要素来衡量一国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视角。因此，提高经济增长潜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复杂度。

经济复杂度与经济互补性的概念有着显著的差别。经济互补性是以当前时点的静态资源禀赋为考察对象，比较了不同经济体生产与贸易结构的差异，目的是各自的优势产品互相补充，共同提供效用，实现市场竞争的均衡，增进社会总体福利；而经济复杂度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寻求生产与贸易结构差异的原因，着眼于经济体的综合生产技术能力，探究经济体的结构演化过程。经济复杂度的刻画有两个维度，即多样性和普遍性。一方面，一国拥有的知识和能力越多，意味着其能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产品的多样性越高。另一方面，产品需要的知识越多、越复杂，则有生产能力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越少，即产品的普遍性越低。显然，多样性越高、普遍性越低，经济复杂性越高。经济复杂度指标的核算以国际贸易的出口信息矩阵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为基础，从单个国家出口某种产品的数量出发，通过递归过程，对于国家，计算出口产品的平均普遍性和平均

^① D. Hartmann, C. Jarafigueroa, M. Guevara, et al.,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Papers, 2017.

多样性；对于产品，计算出口这些产品的所有国家的平均多样性以及这些国家出口的其他产品的平均普遍性，从而定义经济复杂度指数^①。经济复杂度体现了一国所拥有的生产技术和能力的多样性，经济复杂度越高，该国越有能力生产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进而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因此，提高经济复杂度是促进各国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那么如何提高经济的复杂度呢？一是通过长期的、持续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教育和培训，提升科技水平，提高知识和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发展中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资本有限，短期内并无能力进行大规模人力资本投入和新兴产业的初始投入，因此，通过自身积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经济复杂度的方式难度较大。二是从国外引入资本和技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及其他产业合作形式，跨越自身积累阶段，加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全球产业链中，实现自有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从而推动经济复杂度的提高。

R. 豪斯曼和 B. 克林格（2007）在产品空间和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中指出，一国比较优势演化和产业结构转型与其产品空间中产品之间的联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即总是向与原产品联系密切的产品演进而不是向联系较少的产品演进。在产品空间中，一个企业决定是否要从现有的产品“跳到”生产另一种新产品上，关键在于产品距离，即两种产品之间所采用的技术、能力、知识等因素的差距。产品距离越大，意味着两种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能力差异越大，企业需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因素越高。这意味着一国生产能力积累和产业转型的过程是渐进而缓慢的。如果有外资进入，将加快一国产业转型的进程。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承担内资企业无力或不愿承担的“产品跳跃”的风险，并通过技术溢出等途径将生产新产品所需的知识和能力扩散到内资企业，进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帮助一国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

二 “一带一盟”国家的经济复杂度和 “一带一盟”的对接机制

新兴经济体普遍具有出口产品多样化的期待，希望通过生产和出口更

^① 经济复杂性指数 $ECI = \frac{\vec{k} - \langle \vec{k} \rangle}{\text{stdev}(\vec{k})}$ 其中， \vec{k} 表示矩阵 A 第二特征根的特征向量， $\langle \vec{k} \rangle$ 表示平均值， stdev 表示标准差。

多种类的产品，摆脱依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出口的局面。但是，在多样性增强的基础上，还需要提高要素密集度，改善产业结构，更多地出口附加值高、其他国家没有能力生产的产品，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和产业的整体实力，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与中国的产业发展阶段有所差异，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都面临着提升要素密集度的发展任务。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严重依赖能源资源及农产品出口。根据2017年各国SITC出口数据分类统计显示，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两国70%以上的出口产品是矿物燃料、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不足30%，其中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占比更低，哈萨克斯坦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占比最低，仅为3.85%，亚美尼亚次之，占比6.16%。其他三国情况略好些，但也都是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其中白俄罗斯是联盟成员国中初级产品占比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较高的经济体，初级产品出口占比40.43%，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占比22.68%，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占比36.89%。但与中国相比，白俄罗斯的出口结构还有一些差距。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比5.01%，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占比41.98%，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占比53.01%。丰富产业体系、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面临的迫切产业发展任务。

表1 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出口结构（按要素密集度划分，%）

产品类别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亚美尼亚	中国
初级产品	58.17	40.43	74.27	48.76	70.70	5.01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	15.33	22.68	21.88	28.27	23.14	41.98
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	26.50	36.89	3.85	22.97	6.16	53.01

资料来源：UNCOMTRADE数据库，根据SITC分类统计数据整理，其中中国数据是2016年，其他国家数据是2017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一个农业大国发展成世界的“制造工厂”，建立了较完备的产业体系，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主要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中低端制造业。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往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发展高端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是中国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占比普遍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占绝大比重。其中日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

成品出口占比达 78.32%，德国占 71.83%，其他几个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占比也都在 60% 以上^①。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工业制成品的资本技术含量明显偏低，亟待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的升级。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公布的经济复杂度指数（ECI）排名显示，2016 年居于前列的都是发达国家，其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瑞士，其次为日本和新加坡，这三个国家的 ECI 都在 2 以上。中国的 ECI 为 0.89，在 86 个国家中排名第 18 位，仅次于意大利（0.95）。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整体排名居中后位，其中 ECI 指数最高的是白俄罗斯，为 0.34，排名第 30 位，其次为俄罗斯，ECI 指数是 0.14，排名第 34 位，吉尔吉斯斯坦的 ECI 指数为 -0.57，排名第 57 位，哈萨克斯坦的 ECI 指数为 -0.7，排名第 62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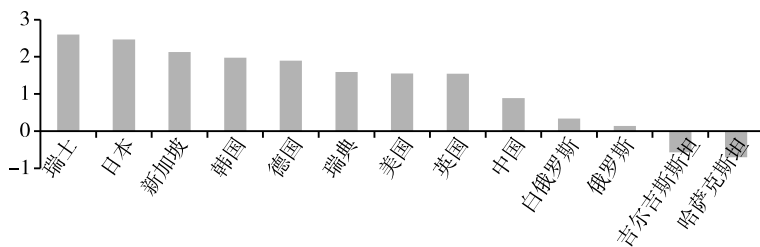


图1 2016 年有关国家 ECI 指数

资料来源：<https://atlas.media.mit.edu/en/rankings/country/eci/>

具体来看，中国出口的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是 522 种，超过 ECI 指数排名前列的国家，包括瑞士（201）、日本（352）、新加坡（179）、韩国（257）、德国（518）、瑞典（320）、美国（437）和英国（350）等国，说明中国产品的多样性很高，但同时产品的普遍性也过高，即中国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普遍过低，要提高中国的经济复杂度指数，需要降低产品的普遍性。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种类最多的国家是白俄罗斯，有 236 种，其次是俄罗斯（167）、吉尔吉斯斯坦（162）、哈萨克斯坦（99）和亚美尼亚（97）。多样性不足和普遍性过高是

^① UNCOMTRADE 数据库，根据 SITC 分类统计数据计算，其中，法国数据是 2016 年，其他国家数据是 2017 年。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亚美尼亚两国。提高经济复杂度指数需要在这两方面上同时做文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机制以提高经济复杂度、促进产业发展作为核心基础。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从国际经贸合作的角度来看这份文件，可以发现，这几个领域的合作如果能够顺利开展，就将极大地促进东道国产品多样性和减少产品普遍性。促进产业多样性的措施是推动产业体系建设，包括完善产业链、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形成上下游一体化的生产链、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制造业等方面的合作；减少产品普遍性的措施是推动产业深化与升级，包括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培育产业优势等，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方面的合作。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中，联系机制是通过生产能力转移、市场拓展、资源优化配置、产业体系完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提高经济复杂度，从而达到产能合作双赢的目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升、生产成本增加以及扩大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利润冲动推动了生产能力的转移。通过产品空间扩展，将东道国优势资源整合进产品生产链之中，弥补产业缺失和不足，丰富产品多样性，实现产业体系和结构的优化。

“一带一盟”对接的内部动力首先来自于转移生产能力的需要。中国建立了较完备的产业体系，产品的多样性在世界上居于前列，部分优势产能在国内已近饱和，既是对资本、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又阻碍了结构效率的提升和产业升级。其次来自于双方产业的互补性。中国人口众多，对农产品和能源资源类产品的需求量大；同时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光伏等方面有很多优势产能、绿色产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需求高度契合，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建立完善工业体系、提升工业化程度亟待需要的。最后来自于产业发展的迫切性。按照俄罗斯出台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经济社会发展构想》，到2020年高科技产品在5~7个领域占全球5%~10%的份额。俄罗斯财政部也发布了获得政府财政拨款优先发展的产业，包括农业（含农业服务）、加工业（含食品生产）、化工（含石油、医药产品等）、机械制造（航空、船舶、汽车生产等）和住房建

设等。优先投资的产业还包括运输行业、通信与电信和水气电等。目前，在石油天然气等支柱产业仍然是俄罗斯 GDP 增长和财政收入主要贡献者的情况下，产业发展的现实与发展目标存在着较大差距，产业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一带一路”对接的外部条件首先是二战之后现代科技、交通、通信行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生产能力在世界范围的转移从技术角度成为可能。其次是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的需要。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跨国公司开始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构建国际化的生产网络，把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布局到发展中经济体，亚洲四小龙等都是受益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 WTO 之后，发展中经济体普遍认同在经济发展初期利用现有资源优势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有利于经济起步。最后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二战之后，经过关贸总协定 GATT 及世界贸易组织 WTO 倡导的多个回合的世界贸易谈判，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基本是以多边、开放为主要特征。近十多年 WTO 在新议题及农业补贴问题上分歧较大，全球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安排又蓬勃兴起，TPP 和 TTIP 都以设立高标准的 21 世纪贸易协定标准为目标。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一势头才有所遏制。但是当前的世界经济已经相互深度融合，大多数国家都不认同以邻为壑、互相封闭的国际经贸环境，加之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经济全球化因此具有了全新的内涵。

自 2015 年 5 月 8 日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以来，“一带一盟”的对接稳步开展，并已取得了积极成果。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多个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相结合，包括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通道项目、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吉尔吉斯斯坦 2013 ~ 2017 年发展规划等；并且深入开展产能与投资合作，形成了一批产能合作重点项目。2018 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确认形成了产能与投资合作第 14 轮总投资 276 亿美元共 51 个重点项目，与俄罗斯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着力推动 73 个重点项目，与吉尔吉斯斯坦商定第 2 轮中吉产能与投资合作 22 个重点项目。塔吉克斯坦是棉花生产大国，但棉花加工能力仅占全国棉花产量的 10%，中塔两国共建中亚最大纺织企业后将加工能力提升到 40%，加工后

的纯棉纺线90%以上销往海外市场,成为塔吉克斯坦出口创汇第一大户^①。截至2018年年初,已有中国、白俄罗斯、美国、德国等8个国家的33家企业进入中白工业园投资建厂,协议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这些企业充分利用园区和欧亚经济联盟的优惠条件以及原苏联国家签署的独联体自由贸易协定等,面向原苏联3亿人口和欧盟5亿人口的大市场,在机械设备、电子通信、新材料、生物医药、物流等多个领域进行生产制造。在白俄罗斯等国,这些领域多数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甚至就是产业空白^②。建立在提高双方经济复杂度指数、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基础上的产能合作,将为“一带一盟”的对接提供持续动力。

三 对接的挑战

以提高经济复杂度为目标的产能合作给“一带一盟”对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此带动“一带一盟”在金融、贸易、人文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受对接涉及主体多、利益诉求多元化、信息沟通尚不充分等因素影响,“一带一盟”的顺利对接仍面临诸多挑战。具体来说,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错配上。

(一) 期待错配

一是坚持市场化原则,而非进行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普遍乐于接受经济援助。“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均将接受外援作为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从一开始就表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大的责任^③。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美元人

^① 《“一带一路”项目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困难?外交部回应》, <http://www.fmprc.gov.cn/web/>, 2018年7月16日。

^② 《中白工业园起步3年 协议投资额超10亿美元》, <http://www.cnr.cn>, 2018年4月26日。

^③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2015年在中国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中,提出要扩大留学生规模和提供医疗援助等。

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①。围绕“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中国援建了近60个农业、工业、交通、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②。可以看出,对外援助是中国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是平等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合作,坚持市场运作是基本原则,合作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对外援助是两者对接合作的帮助和促进力量,不是核心方式,不应混淆市场化原则与援助的地位。

二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功能定位认识有差异。以俄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欧亚经济联盟负责经济规则的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专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方学者则强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包含创新贸易模式,增加相互投资,加强能源合作,深化金融、农业、高新技术和其他产业合作以及环境保护、人文等领域的合作^③。对功能定位的认识差异影响着推动“一带一盟”对接的积极性。

三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看好“一带一盟”对接蕴含的巨大机遇,但同时担心中国把中亚当作中国商品的销售市场、自然资源的来源国和运输中转区;中国在中亚的投资(乌兹别克斯坦除外)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而非实体经济。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很难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可能担心该地区的再工业化投资将为中国出口工业产品带来竞争对手,而中亚国家则会担心随投资而来的中国工人会加剧其本身劳动力过剩的困境^④。

(二) 领域错配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普遍希望通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合作,引进中国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特别是俄罗斯,本身具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但在一些高端制造业的仪器设备、电子元器件等方面依赖西方国家的进口。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切断了俄罗斯从西方国家高端设备等的进口,也中断

① <http://business.sohu.com/20170514/n492960927.shtml>

②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3-21/doc-ifysmzuy4781836.shtml>

③ 万青松:《“一带一盟”对接合作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努力的方向》,《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④ [哈] K. Л. 瑟拉耶什金,徐向梅译:《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

了与乌克兰的技术合作，俄罗斯急需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发展高科技产业^①。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均是能源富裕的资源型国家，双方在能源资源领域的互补性明显，且之前就建立了较好的能源合作关系，在“一带一盟”对接中，资源能源领域自然而然成为双方对接合作的优先领域，一批能源合作项目得以快速推进^②。目前，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产能合作主要以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为主，而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希望的高科技领域，“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项目不多，进展不大。

（三）主体错配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最终的实施主体是企业。从目前的合作实践来看，承接“一带一盟”对接项目的基本都是国有大型企业，例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气”、“国家电网”、“中国中铁”、“中国银行”、“中国信保”等，中小企业参与的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作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国有企业有义务积极参与；另一方面，相比中小型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具有开展跨国经营的强大优势，包括资金、人才、技术、管理和经验等，比中小型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强。但是，东道国可能因国有大型企业的政府背景和强大实力而担心对当地产业和社会产生冲击。中小企业多为私人企业，创新能力强，吸纳就业人数多，更容易受到东道国的欢迎。

（四）环境错配

良好的环境是“一带一盟”顺利对接的重要保障。目前来看，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其他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营商环境不佳、制度不健全、政治和安全形势复杂等问题，“一带一盟”的顺利对接存在障碍和挑战。

① 杨文兰：《中俄两国产能合作现状与未来的战略布局》，《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② 包括2014年中俄两国东线、西线两条天然气管道建设，特别是东线管道建设进展顺利，预计2018年年底投入运营；2018年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建成投产运营；2017年中哈天然气管道二期全线完工等。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中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成果最丰硕的国家，至今双方已达成14轮产能合作重点项目清单。据统计，2014~2017年三年时间，在已实施的34个中哈产能合作项目中，12个属于油气资源开采领域，3个属于非油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领域，10个属于加工制造领域，8个属于交通、电力、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1个属于环保领域。《中哈产能与投资合作项目盘点》，《中国投资》2017年第19期。

就营商环境而言,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均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腐败、金融市场不发达、受教育的劳动力不足、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不高等共性问题。腐败盛行使得在这些国家经营商业的隐性成本增加,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权力凌驾于制度和市场之上,加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这些国家金融市场方面普遍存在着资本价格扭曲、融资工具少、成本高、渠道不畅、外汇短缺、交易困难等问题,拖欠货款现象也比较严重,资金回收风险大。同时知识型劳动力不足导致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受到限制,技术吸收能力和产业升级速度也受到负面影响。知识型劳动力的培育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社会问题。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并不愿意从其他国家引进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担心加剧本来就比较突出的失业问题。对于产能合作而言,国际产业链分工要求各个生产和贸易环节能够运行通畅、无缝对接。目前,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程度有限,各种隐性的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障碍依然比较多。

就制度环境来看,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都不够健全。中国尚没有专门的对外投资法,对外投资实行“核准和备案制”^①,需进一步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推进境外投资条例制定工作。作为转型经济体,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法律制度尚处于建设过程中,法律法规不健全,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这些国家在财产权、知识产权和少数股东权益保护方面在全球排名都很落后,特别是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全球137个国家中排名均在100位之外。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经常因单方面原因违背契约精神、搁置合作项目。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中包含合作项目200多个,但很多都被中途搁置,甚至从未启动,给中方造成巨大的损失^②。“一带一盟”部分国家政治环境复杂,社会治安和稳定性较差,严重威胁着双方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中亚地区面临着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严重威胁;独联体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与资源纠纷,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

① 2018年1月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② 林彩:《“丝绸之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可行性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塔吉克斯坦三国因费尔干纳盆地地区的边界争端以及水资源纠纷而长期处于关系紧张之中，近年来三国在此爆发了数十次武装冲突；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持续恶化，与格鲁吉亚2008年曾爆发小规模战争；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局一直不稳定，国内政治派系斗争激烈，外部又面临“颜色革命”的威胁；由于历史原因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①。在这样的政治和治安环境下开展投资经营合作，不仅将面临严重的人身安全隐患，而且合作项目随时可能因武装冲突、战争、政权更迭而被中止和破坏，经济利益难以有效保障。

四 对接顺利发展的环境塑造

从产能合作方面来看，“一带一盟”对接的顺利发展关键依赖于环境改善和制度保障。

从营商的大环境而言，中国应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加强信息交流与项目合作，共同填补营商环境短板。最近几年，中国大力开展腐败治理，在腐败的惩治和预防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双方可就反腐经验进行交流合作，共同提高反腐能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增强政策透明度，为企业合法经营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

在金融合作方面，中国提议筹建的丝路基金、“亚投行”等为“一带一盟”的对接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同时需加强“一带一盟”国家的金融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建设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和货币金融稳定机制，构建双边货币结算机制，继续加大货币互换和金融开放的力度，推动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同步企业“走出去”，并在创新融资工具和风险管理措施上加强研究和探索。

在培育受教育的劳动力方面，中方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已承诺扩大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等。同时开展产能合作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对员工的技术技能和职业培训，逐步提高当地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水平，扩大技术型劳动力储备。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也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劳动力政策，支持中国的技术工人能够去当地的工厂中传帮带。

^① 谢晓光、生官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面临的挑战及应对》，《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在基础设施领域，目前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合作的产能投资项目中很多都是道路、铁路、港口、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预见随着合作项目的逐步开展，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也将逐步改善。

从制度环境而言，要推进“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必须要搭建良好的制度框架，为双边经贸和投资合作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提高投资者信心。目前，“一带一盟”的制度合作已取得初步成果。2018年5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这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首次在经贸方面达成的制度性安排，标志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经贸合作从项目带动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协定范围涵盖海关合作和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部门合作以及政府采购等13个章节，包含了电子商务和竞争等新议题，旨在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但是经贸合作协定并不涉及较为敏感的关税议题和更为敏感的投资议题，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拓展，所构建的制度保障水平还远远不够。为此，要在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往前推进，将经贸合作协定升级成自由贸易协定，扩展协定领域和内容。如果目前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尚不具备，就尽可能地签订国家之间的功能性合作协议，如保护投资及投资便利化、避免双重征税、中小企业发展、职业资格和学历互认以及各产业领域合作协议等。同时，从长期来看，也研究在欧亚地区构建涵盖范围更大的制度合作框架^①，扩大“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辐射效应和规模效应。

在政治和安全环境方面，首先，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抗击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方面要加强交流与合作，防止“三股势力”侵入，影响中国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其次，对于部分国家因为内政、领土、资源等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和纠纷，号召各国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与协调，以经济合作促进地区稳定。同时，要加强对相关国家政治和安全形势的密切关注和安全教育，做好预警和防范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

（责任编辑：高晓慧）

^① 国内一些学者探讨了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自贸区的可能性；201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万青松：《“一带一盟”对接合作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努力方向》，《欧亚经济》2016年第5期。